



## 生活是文学的源泉

一位作家最幸运也最成功的标志,是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学地理空间,形成自我标识性的创作风格与文学身份。这需要一些艺术的直觉、敏感,更需要作家持之以恒的努力以及对艺术的绝对忠诚。张国龙对四川乡村少年的书写已经颇有一些积累,他坚持不懈地写,无功利地写,终于开花结果,越写越好。透过他的探索与实践,我们能够对原创儿童文学,特别是少年文学的艺术新变获得一些深刻的启示。

张国龙的写作姿态,首先引发我们对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作出真诚的反思。毫无疑问,文学的根是生活,生活是文学唯一的源泉。写作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是由对生活的立场和态度决定的。文学的出发地与归宿地只能是鲜活的、原生态的生活。如果说创作没能形成崭新的面貌,那我们首先要追问,是不是自己的生活观出了问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恒定的路径只能是在生活现场,始终秉持实践论的美学观念,关注并写出人民的喜怒哀乐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尊重并投入生活显然比艺术技巧更为根本,特别是在当今人工智能参与现代人生活的当下,我们尤其要关注的是独一无二的作家灵魂究竟能为文学赋予什么。张国龙的文学信仰立在广袤的民间大地上,特别是他生长生活的那块土地上。他将“生活”作为写作的中心

与主体,在文学与生活之间始终建立起赤诚的情感联系,而且将追求写透生活、让生活留史作为至高的艺术目标,他的创作观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他在用实践回答文学究竟“为了谁”,以及“如何为”的问题。

持之以恒地写生活,便能写出生活的味道,写出生活的品质。《瓦屋山桑》较之作家此前的同类题材创作,显然笔力更自然雄健,生活与艺术的质感浑然一体,观照、介入、反思现实更练达通透。作品一如既往地聚焦成长,坚持现实主义创作传统,重视人与环境的辩证关系处理。作家以火热的生活激情打底,但以冷静、节制的笔致去触摸生活的本相,遵循生活自身的规律去探知人生的答案,而不是随意、想当然地附会作家的意图,这应该也是张国龙对生活始终持敬仰态度的结果。所以他笔下的人物能够活起来,人物强烈的主体性得有托底的东西,我觉得就是来自生活实践的那股永远充沛的力量。《瓦屋山桑》有中心人物,但也有人物群像。群像塑造是儿童文学成长内涵书写的必然构成,它在积极面对少儿与生活的多元现实命题,群像愈饱满愈显示生活的复杂性。

为少年代言,将少年的生活置于高度的文学关怀中,这是儿童文学人文精神的核心体现。作家与学者的双重身份,使得张国龙从感性到理性,对文学表达世界、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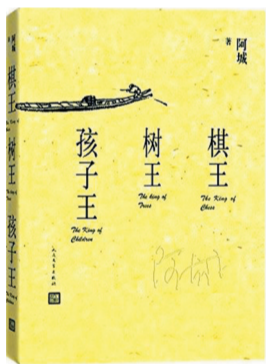
达自我的特殊方式认识非常深刻,尤其是对成长书写的艺术理解与使命践行,他在国内儿童文学界是居于前沿的。写作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对生活的一种调理,它基于生活素材要对人生作出审视,彰显存在命题并作出价值选择与价值建设,儿童文学的文类特质及其功能尤其决定了它面向生活的立场与态度,以及最终给出答案的角度与方式。写给少年的文学体贴关怀少年的成长境遇,它以文学的方式将少年读者带入不同的生活场域,与作品主人公发生深度共情,集中、有秩序、有深度地对生活作出全面的体验与检视。最根本的是它要突破日常生活的琐碎,直面生活的复杂性并从中提炼价值命题,引导少年自主参与并作出理性判断,儿童文学从本质上看为儿童提供的是朝向生活实践的方法论,当然其内核是应对生活的巨大精神能量。张国龙的写作在这一点上是自明的。

近些年他以系列写作的方式,以浓厚的历史意识关注乡村少年的精神成长,思考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乡村少年这一群体的成长与社会发展问题。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近些年来儿童文学界对此领域多有探索与艺术表现,张国龙在此领域也已经比较清晰地形成了自己的方向与写作理路。他的写作不是一时一地、从外部进入的方式,而是持续聚焦自己的故乡、以

自我深切的情感体验为基础、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看山乡巨变中乡村少年的人生轨迹。我觉得他为乡村少年写作最大的价值不是高高在上地、先在地给出某种想当然的方案,而是在乡村生活自身的逻辑里,从生活内部清理出必须面对的现实命题,以中心人物的心理与行动再现为轴心,以其他人物多样化人生经历为呼应,在情感与故事的审美张力中渐进浮现乡村少年成长必然面临的关键命题——就是“走出”还是“坚守”的两难选择。这个问题看似是个体的,但其实它直接有关于中国式乡村现代化的发展问题。从乡村建设主体这一层面看,这与少年人的身份认同、觉醒的主体性、责任使命意识、中国伦理精神等多个维度都紧密相关。其中存在很多矛盾与悖论,张国龙的写作目前对此充满着浓厚的问题意识,也有深刻的反思性,特别是呈现出典型的中国式情感样态,就是对“家”与“家园”的固守与守护立场。

乡村少年发展这是一个重大的社会命题,特别是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儿童文学界可为、必为的空间非常大。希望张国龙从历史出发,始终紧跟时代,以“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评价标准,在该领域继续深耕劳作,推出更多直面现实真命题、呈现时代新气象的精品力作。

据《光明日报》



## 有穿透力直抵人心的作品

——读《孩子王》有感

再次品读当代作家阿城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的小说《孩子王》,思绪依然随着情节起伏,甚至想问一问,书中那个叫王福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有人说阿城是“作家里的作家”,的确,他的中篇小说的穿透力超越时间、直抵人心。

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被誉为“寻根文学”的发轫之作。3篇小说都是写上世纪上山下乡时期,以插队知识青年的视角,写出了发生在云贵山区的故事。《孩子王》是“三王”系列中的最后一篇,与前两篇的主人公不同。《棋王》写的是棋呆子王一生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树王》写的是树王肖尧禧保护古树失败,抑郁而终的故事。《孩子王》写知青老杆儿,即“我”的教学经历。《孩子王》的书名,可能出自“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的俗语。小说以“我”为主线,插队7年,被抽调到山村学校担任初三语文老师,发现学生连小学课本上的字都不认识,决定在识字中,教写真情实感的作文,却因改变教学内容被退回去的过程。在老杆儿短暂的教学生涯中,王福是唯一写出名字的学生。

老杆儿来到学校,听负责人老陈介绍情况时,看见他桌上有一本小小的《新华字典》。刚读小说的时候,我把这一笔忽略了。当读完小说再品味时,才恍然作家宕开的这一笔,与后面有关字典的内容不动声色地勾连起来,契合传统小说中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笔法。俄国戏剧家、小说家契诃夫曾经有一段著名的文学评论,“前面写到客厅的墙

上挂着一支猎枪,那么这支猎枪在最后一一定要射出子弹”。这本字典作为一个意象,贯穿在小说的故事情节中。

1976年大山深处的学校,草房教室里,摆着无漆却又脏得露不出本色的桌椅。学生没有书,老杆儿拿一本很脏的语文书抄完后,问课文说的是什么?没人回答,因为学生大部分字不认识。这时听见一个学生大声说:“你这个老师真不咋样!没见过你这么教书的。该教什么就教什么嘛,先教生字,再教划分段落,再教段落大意,再教主题思想,再教写作方法。该背的背,该留作业的留作业。我都会教。”直率的话语,如同小石子投进一潭死水中,激起不小的水花。敢于指出老师问题的就是王福。作家用素描一般的笔墨,勾勒出一个生活贫困、但成熟懂事、善于总结的孩子形象,也折射出僵化的教育模式。

更令老杆儿惊讶的是,王福一个本子密密麻麻写满了独个的字。他把从小学到初三认识的汉字——3880个字,认真工整地抄写下来。王福是在一个字一个字地编写自己的字典。当时的字典是班上的圣物,王福更把字典看成是“老师的老师”,他编写“字典”,渴望有一本新华字典,因而与老杆儿打赌,想赢得老杆儿那本知青送他的字典。

王福为了获得字典,回队跟他哑巴父亲一起,把整个三队第二天的劳动任务——230棵竹子全部砍完,赶回家在凌晨之前把作文完成。小说没有写父子两人砍竹的情景,只写王福衣裤上无一处

干、湿湿地贴在身上。我们从一夜砍倒的竹子数量中,可以想象父子两人劳作的画面。大山里、夜幕下、晨曦中,他们一根根地砍着碗口粗的竹子,“邦邦”的声音,在山坳里回响,随着飘荡的雾气弥漫到山外。王福一把一把地抹着汗水,看横七竖八的绿竹,如同看到字典上一个个字。他不再叹息,拥有竹子就拥有字典“老师”。竹子与字典,两种毫不相干的事物,在作家笔下巧妙地连到一起,隐喻着王福“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

王福因先写作文后运竹子,在打赌中输了。倔强的王福,不肯接受老师的馈赠,他说,“我要把字典抄下来。每天抄,5万字,1天抄100,500天”。王福执着地抄着字典,每日放了学,便在老杆儿屋里抄字典。队里罕见地放电影,他不去看,在抄;让他吃饭,他不抬头,仍旧抄。在他心中,字典比一顿饭要管饿,是他长久的精神养分;字典比一场电影更有魅力,开启的是一方缤纷的天地。王福当时或许不知愚公的故事,但他迸发着愚公般坚韧的力量,因他背负着两代人对文化的膜拜。他在《我的父亲》中写道,“父亲是一个不能讲话的人,但我懂他的意思……我要好好学文化,替他说话”。一个坚定执着渴求知识、有高贵尊严的孩子形象跃然纸上。

有作家评价阿城的作品:“他笔下人物共有的特点,即恬淡超脱与沉迷执着的结合,恬淡超脱对应人物的表层性格,沉迷执着正是人物内心的性格。”一针见血、一语中的。  
赵文新



## 《夜樱与四季》

本书呈现的是在21世纪10年代的中国大地上,行走和漂泊着的女性们的生活——暮春的上海,在天台上和人争论自己剧本的戏剧系女大学生;夏季山洪过后来镇上寻找爱人,却决定与之分手的女人;越来越浓的秋意里,执着想要找回失踪丈夫的外来船员的妻子;冬日庞大的北方城市,选择放弃过往,独自面对绝症父亲的女儿。时间推移,年代流转,带来了她们生活和命运的转变。

她们的回忆、她们的行动、她们隐藏起来的过往,形成这本小说集丰沛的情感张力,也汇聚成当下的时代声音。

作者张玲玲,小说家,出版有小说集《嫉妒》。第一届“短篇小说双年奖”得主。

## 《最后的故事》

小说由三代女性发生在不同时空的三个故事组成:伊达因车祸来到一间乡野小屋,她与一条垂死的狗滞留在了这个她度过童年的地方;帕拉斯凯维亚常年居住在山上远离尘烟的房子里,她的丈夫在星期日的晚上去世了;玛雅离婚后带着儿子前往位于中国南部的小岛旅游,遇到一位患病的魔术师。母亲、外祖母、女儿,她们的道路早已分开,生命却又紧密相连。现在,她们将独自面对避无可避的“死亡”,这是她们“最后的故事”……

作者奥尔加·托卡尔丘克,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2019年授予),代表作有《爱尔娜》《太古和其他的时间》等。